



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

上海教育出版社

修 辞 学 发 凡

陈 望 道

上海教育出版社

0574/14

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原上海人民版)

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16,000

1997年12月新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50本

ISBN 7-5320-5425-X/G·5667 定价: 13.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把存在汉语语文中的种种修辞方法、方式，以及运用这些方法、方式的原理原则，加以系统的阐释，并且指明它的发展方向。在阐释和说明中，随处引用丰富、适切的白话和文言的例子作证。对于系统地研究修辞学，对于了解古典文学和练习现代文写作，都有一定的帮助。

全书共分十二篇。第一篇概括地述说修辞现象和修辞学的全貌。指出修辞现象有消极和积极两大分野，又指出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和修辞所须适合的题旨和情境。第二篇述说修辞所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第三篇述说消极和积极两大修辞分野的互相区别和互相联系。第四篇述说消极修辞的一般情况。第五篇到第九篇都是述说积极修辞，其中第五到第八篇述说积极修辞中的辞格，第九篇述说积极修辞中的辞趣。第十篇述说修辞现象随种种不同情况而变化，以及它的统一的线索。第十一篇述说语文的种种体式，特别详述了体性方面的体式。第十二篇结语，述说修辞学的变迁、发展，并指出研究修辞学应有的努力。

初版是1932年，分上下两册，由大江书铺在上海先后印行。以后再版重印过多次，作者也不断地有所修改。这次重印，由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根据作者生前修订的一九六二年本和一九七五年本参照校订，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正。

目 录

第一篇 引言

一	修辞两字习惯用法的探讨	1
二	修辞和语辞使用的三境界	3
三	修辞和语辞形成的三阶段	5
四	修辞同情境和题旨	9
五	修辞的技巧和修辞的方式	11
六	修辞研究的需要、进展和任务	14
七	修辞学的功用	17

第二篇 说语辞的梗概

一	修辞和语言	20
二	“态势语”	21
三	声音语	24
四	文字语	26
五	声音	29
六	形体	31
七	意义	32
八	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34
九	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	36

第三篇 修辞的两大分野

一	形式和内容	39
二	内容上的准备	41

三	两种表达的法式	43
四	语辞的三境界和修辞的两分野	45
五	两大分野的概观	47
六	两大分野的概观二	50

第四篇 消极修辞

一	消极修辞纲领	53
二	意义明确	54
三	伦次通顺	60
四	词句平匀	62
五	安排严密	66

第五篇 积极修辞一

一	积极修辞纲领	70
二	辞格	71
三	譬喻	72
四	借代	80
五	映衬	92
六	摹状	95
七	双关	96
八	引用	103
九	仿拟	108
十	拈连	114
十一	移就	115

第六篇 积极修辞二

一	比拟	117
---	----	-----

二	讽喻	119
三	示现	124
四	呼告	126
五	夸张	128
六	倒反	132
七	婉转	135
八	避讳	137
九	设问	140
十	感叹	143

第七篇 积极修辞三

一	析字	145
二	藏词	159
三	飞白	163
四	镶嵌	166
五	复叠	169
六	节缩	177
七	省略	183
八	警策	187
九	折绕	188
十	转类	190
十一	回文	194

第八篇 积极修辞四

一	反复	199
二	对偶	202
三	排比	203

四	层递	205
五	错综	207
六	顶真	216
七	倒装	219
八	跳脱	221

第九篇 积极修辞五

一	辞趣	229
二	辞的意味	229
三	辞的音调	234
四	辞的形貌	239

第十篇 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

一	格局无定	242
二	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	244
三	修辞现象常有上落	246
四	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	249
五	适应更是形形色色	252
六	变化的统一	254

第十一篇 文体或辞体

一	文体或辞体和文体或辞体的分类	256
二	简约繁丰	257
三	刚健柔婉	259
四	平淡绚烂	263
五	谨严疏放	271
六	语文体式的繁复情况	275

第十二篇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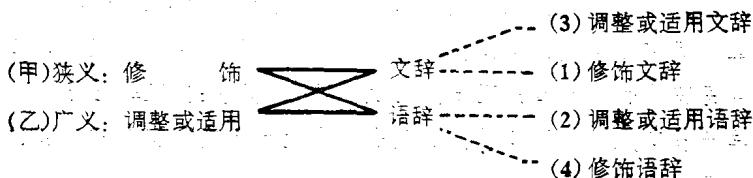
一 从修辞学术萌芽时期说起	277
二 修辞文法混淆时期	278
三 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	279
四 结语	282
一九七五年重印前言	284
一九六二年重印前言	286
初版刘序	288
初版后记	293

第一篇 引言

一 修辞两字习惯用法的探讨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便常常连着用的。连用久了，自然提起了辞字，便会想起了修字，两字连结，简直分拆不开。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两相交互，共得四种用法如下：



这四种用法，现在可说都是有人在那里用的，不过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分别罢了。我们要讲修辞，对这意识的或不意识的习惯用法，必须约略先加探讨。

第一，是文辞还是语辞？这在过去，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讲修辞，自然修的是文辞。如顾亭林所谓“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

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便是隐隐含有这种意思的一个例。但若略加考察，便知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在中国，后来固然有过一大段语文分歧的时期，执笔者染上了一种无谓的洁癖，以谨谨守卫文言为无上的圣业。而实际从语体出身的还是往往备受非常的礼遇，如“於菟”“阿堵”之类方言，竟至视同辞藻，便是其例。如所谓谐谑，逐渐发展，成为灯虎商谜，竟至视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而(1)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要是承认下游的文辞的修辞方式，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语辞的修辞方式。(2)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认文辞的修辞方式，也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语辞上同等的修辞方式。(3)既是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即不追寻源头也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文辞独得之秘。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何况文辞现在也已经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而我们听到“演说的修辞”云云，也早已没有人以为不辞了。这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语辞认作修辞的工具了。

第二，是修饰还是调整？这在过去，也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说修辞，当然说的是修饰。如武叔卿所谓“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见唐彪《读书作文谱》六)，便是指修饰而说的一个例。这也只是偏重文辞，而且偏重

文辞的某一局部现象的一种偏见。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是在(1)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较有修饰的余裕；(2)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

二 修辞和语辞使用的三境界

至于所谓华巧不是修辞现象的全领域，我们只须从修辞的观点把使用语辞的实际一查考便可以了然。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内中(甲)(乙)两个境界对于语辞运用的法式，可说截然的

不同。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极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积极的手法。例如郑莫氏所举的《论语》的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和《古诗十九首》中的

迴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便是绝好比照的两个例。两例主要的意思可说完全相同，而一只“直写胸臆，家常谈话”，单求概念明白地表出，一却“托物起兴，触景生情，而以嗟叹出之”，除却表出概念之外，还用了些积极手法。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如这首古诗的整整齐齐每句五言，便是一种利用字形所成的现象。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在修辞上有这魅力的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同内容贴切的，其魅力比较地深厚的，叫做辞格，也称辞藻；一种是比较同内容疏远的，其魅力也比较地淡浅的，叫做辞趣。两种之中，辞藻尤为讲究修辞手法的所注重。在小说诗歌等类叙事抒情的语言文字上用得也最多。所谓华巧，也便是指这种形式的表面特色说的。

而实际，正如王安石《上人书》所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的标的。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

极的修辞手法。

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当“宁质毋华”的时候便“宁质毋华”；当“宁拙毋巧”的时候便“宁拙毋巧”。（甲）一境界清真的语辞，实际都是单独用这种手法的。（丙）一境界的语辞，清真的部分也是单用这种修辞手法的结果。如上举“君子”云云，便是一个例。这是古话所谓“质”的部分。

此外古话所谓“文”的部分，如（乙）的全体及（丙）的另一部分，实际消极方面也不能不参用消极手法，而求语辞的精确明白。这又就是古话所谓“文附质”、“质附文”的质文相待情况。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与王若虚《津南遗老集·新唐书辨》所谓“作史与他文不同。宁失之质，不可至于芜靡而无实；宁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略而不尽。宋子京不识文章正理，而惟异之求。肆意雕镂，无所顾忌。以至字语诡僻，殆不可读。其事实则往往不明，或乖本意”，可说便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

三 修辞和语辞形成的三阶段

我们若再考察涉及内容的语辞形成的三阶段，将更可以明了修辞的实际情形。

语辞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段的，无论笔墨或唇舌，大约都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写说发表。这三个阶段的工作都依赖于社会实践，并受一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影响。但某些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如收集材料最与生活经验及自然社会的知识有关系；剪裁配置最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

等等有关系；写说发表最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有关系。三个阶段的条件顺次递积，到了写说发表的时候，便已成为与政治立场、世界观，与社会实践的经验、自然社会的知识，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等等无不有关的条件复杂的景象。而语辞形成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一定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收集材料；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剪裁并配置所收集的材料；也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写说发表所已经剪裁定妥、配置定妥的材料。这种需要，在语辞上常被具现为一篇文章或一场说话的主意或本旨。若将写说单作写说者个人的情事看，可说写说便是为了发挥这个意旨起见，运用语辞来表出上述条件复杂的景象的一种工作。

但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而尤以发表这一阶段为切要。因为这一阶段，是写说者将写说物同读听者相见的时候。写说者和写说物和读听者各都成为交流现象上必不可缺的要素。当这时候，写说者纵然还有“藏之名山”的志向，也不便再以“藏之名山”自豪了。对于夹在写说者和读听者中间尽着传达中介责任的语辞，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注意。看它的功能，能不能使人理解，能不能使人感受，乃至能不能使人共鸣？

古来因为中介语辞不能尽责，甚至闹成笑话的很多。试举几个例子。例如范睢说的：

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见《战国策·秦策》）

这就等于放了一个谣言。缺失最大。也有缺失不到这样程度的，例如钱大昕说的：《论语》的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也就有两解：一，把“攻”作攻治解，“已”作助词“了”字解；二，“攻”作攻击解，“已”作动词“止”字解。（见《养新录》三）又如鲁迅批判过的一例：

“此生或彼生”

这是汪懋祖为鼓吹尊孔读经，主张恢复文言而提出的例证。他声称此语比白话文“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要“明了”“省力”。鲁迅当即予以驳斥，指出“这五个字”除了“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外，“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见《花边文学·“此生或彼生”》）这就充分论证了此例含糊费解，有力地抨击了那种尊孔复古的谰言。

根据这种事实上的缺失及其他事实上的需要，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晃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

同这现象有关系的具体的事项自然极其复杂，即就上头说过的来说，便已有政治立场、世界观的关系，有社会实践的经验的关系，有自然社会知识的关系，有见解识力的关系，有逻辑因明的关系，有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的关系，又有读者理解力、感受力等等的关系。普通作文书上常说的有所谓“六何”说。以为最有关涉的不过六个问题，就是“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等六个“何”。普通常说：第一个“何故”，是说写说的目的；如为劝化人的还是但想使人了解

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第二个“何事”，是说写说的事情：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的讨论等等。第三个“何人”，是说认清是谁对谁说的，就是写说者和读听者的关系。如读听者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第四个“何地”，是说认清写说者当时在甚么地方：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之类。第五个“何时”，是说认清写说的当时是甚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第六个“何如”，是说怎样的写说：如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其实具体的事项何止这六个！但也不必劳谁增补为“七何”，“八何”。至少从修辞的见地上看来，是可以不必的。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看来，觉得上述复杂的关系，实际不妨综合作两句话：（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藉；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象“六何”说所谓“何故”、“何人”、“何地”、“何时”等问题，就不过是情境上的分题。情境是拘束的、理知的，或题旨是抽象的、概念的，如前述（甲）一境界的语辞，便只能用消极手法。例如《史记·律书》说律数便只能说：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而不能用“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那样的夸张法。再如情境是自由的、情趣的，或题旨是具体的、体验的，如前述（乙）一境界或（丙）一境界某部分的语辞，那又未尝不可任情随题，采用积极的表现。例如《南史·到溉传》：

溉孙荃早聪慧。尝从武帝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荃受诏便就。上以示溉曰，“荃定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荃。”因赐绢二十四匹。后溉每和御诗，上辄手诏戏溉